

研究論文

# 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基於CGSS2010數據的研究

程蕭瀟、金兼斌

## 摘要

互聯網已經成為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愈來愈關係到執政黨合法性和公眾支持。本文基於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採用傾向值匹配和工具變量迴歸儘可能克服潛在的內生性問題，並深入探討公眾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發現：相對於政府信任來源的兩種主流解釋——制度和文  
化，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具有較好的解釋力；此外，相比於工具變量迴歸結果，基於傳統OLS迴歸模型估計的互聯網對政府信任的解構作用被低估了近3倍。該研究啟示我們在估算互聯網的效應時應儘可能地避免內生性問題引發的偏誤。

關鍵詞：互聯網使用、政府信任、媒介效果、內生性、工具變量

程蕭瀟，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研究興趣：新媒體使用與社會變遷、科學傳播。電郵：cxx17@mails.tsinghua.edu.cn

金兼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新媒體使用和效果研究、科學傳播、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電郵：jinjb@tsinghua.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19年4月8日。論文接受日期：2019年11月4日。

---

Research Article

##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Evidence from the 2010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Xiaoxiao CHENG, Jianbin JIN

---

### **Abstract**

The Internet has been considered an essential means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Moreover,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elated to public support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2010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ule out a potential endogeneity bias by employing the technique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use of Internet has had sufficient explanatory power in shaping individuals' political trust. Moreov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regression underestimated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removing a potential endogeneity bias in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

Xiaoxiao CHENG (Ph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digital media use and social transi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Jianbin JIN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digital media use and media effects,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methods.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Keywords:** Internet use, political trust, media effects, endogeneity, instrumental variabl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eng, X., & Jin, J. (2021).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Evidence from the 2010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5, 57–9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互聯網時代，社會化媒體似乎構築了一個「虛擬政體」，賦予公眾線上圍觀、討論和參政議政的權能。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充滿弔詭和張力的世界。從公眾與政府的關係來說，一方面，互聯網打造出一個「網絡化公共領域」，多元觀點和意見的交融催生「互聯網民主政治」的美好圖景，形成一種「良性循環」(virtuous circle) (Norris, 2000)；另一方面，「後真相」消解了事實的力量，大量由情感裹挾的輿論洪流引導人們走向「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sup>1</sup>

可以說，公眾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的因果關係及其機制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政府實現「善治」(good governance)、優化公共管理和決策機制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CGSS 2010數據，使用傾向值匹配和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迴歸等方法，估算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真實效應。

## 政府信任的三大來源

政府信任研究起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受「越戰」和「水門事件」的影響，美國民眾出現了犬儒主義式的政治冷漠，對民主體制產生不滿和疏離(林岡、顧佳雯，2016)。在此背景下，政府信任的起源與機制研究成為西方政治信任研究的一個熱點。<sup>2</sup>

### 政府信任來源的兩種主流解釋

回溯政府信任的起源研究，學界存在兩種主流的解釋路徑：制度範式和文化範式(Mishler & Rose, 2001)。

根據制度理論，政府信任來源於政治體系本身，即政府為人民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人們根據績效供給能力進行理性的計算和評估，當民眾對政府績效的感知越明顯，作為一種社會交換行為，公眾回饋政府更多的信任(高學德、翟學偉，2013；Newton, 2001)。具體來說，績效包含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三個維度。就其經濟維度而言，學者認為政府信任受到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公眾對經濟評估的影響

(Chanley, Rudolph, & Rahn, 2000; Hetherington, 1998; Wang, 2005)。例如東歐政治轉型研究發現，個人對國民經濟狀況變遷的預期和感知是影響新生政治制度評價的重要因素 (Kitschelt, 1992; Plasser & Ulram, 1996)。政治績效主要包括公民對在任領導和制度的評價、重大政治事件、不斷曝光的政治腐敗及醜聞，以及政治透明度等，而社會文化績效則體現在諸如犯罪率、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等方面 (胡榮、莊思薇，2017；胡榮、胡康、溫瑩瑩，2011)。在本土研究中，學者已經證實經濟增長、民生福利、惠民政策、公共政策、生活滿意度、社會流動等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影響 (孟天廣、楊明，2012；盛智明，2013；羅家德、帥滿、楊鯤昊，2017)。

與制度理論不同，文化生成論從施信者 (公眾) 的角度出發，強調政府信任的外生性；換言之，政府信任根植於政治系統之外的社會文化規範和社會價值觀 (福山，1998；翟學偉，2014)，進而形成了政治信任的「激勵結構」 (黃健、鄧燕華，2012)。

基於文化範式的政府信任研究主要從文化主義和社會資本兩種理論視角切入。文化主義起源於政治文化概念和公民文化理論，該理論認為不同國家、社會和族群間的政治文化差異解釋了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 (Almond & Verba, 1963)。與中國有關的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探討儒家文化及威權主義價值觀對中國高度政府信任的影響。例如，Shi (2001) 發現中國大陸民眾高度的政治信任水平與威權主義緊密關聯，他指出中國文化中對上下關係的強調形塑了格外特殊的個人與權威之間的關係。Tong (2011) 的研究指出，儒家文化對政府「善」的價值預設和對政府責任的理解與中國政府獲得高信任度有一定的關聯。馬得勇 (2007：85) 通過比較亞洲八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信任分佈狀況，得出「在一個具有專制或威權主義統治歷史的國家，人們對政府的信任不僅基於政府的表現，而且也基於人們對權威的崇拜和依賴」的結論。與此同時，他強調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威權主義價值觀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從而降低人們的政治信任水平——該觀點與西方學者提出的「批判性公民」 (critical citizens) (Norris, 1999) 和「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m) (Inglehart, 1990; Inglehart & Welzel, 2005) 「侵蝕」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府信任的論斷不謀而合。實際上，文化主義觀點強調的是文化價值觀和社會規範對個體早期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儘管有研究指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的深入，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演變成了混雜威權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分化後的權威主義」模式，但威權主義仍可能保持其「威權韌性」(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李路路、鍾智鋒，2015；季程遠、王衡、顧昕，2016)；同時，它亦可能通過基因遺傳的方式保持世代間意識形態立場的相對穩定性(馬得勇、王麗娜，2015)。

社會資本解釋視角的核心在於「網絡」和「互惠規範與信任」兩大要素，強調公民可以從「非政治社會互動中發展出政治後果」(Norris, 2002)。具體來說，公民通過參與公共事務形成橫向連接有利於增強人們的普遍信任，而團體信任的溢出效應促進了個人對政府的信任。在既有的社會資本與政府信任研究中，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操作化存在較大差異。有的研究基於個體社會網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羅家德、帥滿、楊鯤昊，2017)，還有一些學者從個體實際政治行為出發，將社會資本操作化為政治參與行動和社區參與行動兩個維度(胡榮、莊思薇，2017)。研究者在操作化上的差異可歸因於社會資本概念的「多維性」。具體來說，第一種測量方法依據的是林南(2005)的定義，即社會資本是一種關係的財產，必須與文化、規範、信任等集體財產和物品區分開來；第二種操作化基於普特南(Putnam)的概念定義，即社會資本囊括網絡、規範和信任等若干核心要素。本研究採納後一種操作化方式，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網絡數據的可得性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社會資本是個體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動態體現——根據「信任的終生學習」機制，政治信任不僅在早期社會化過程中就已經形成，它亦會被新近的經驗和事件所強化(游宇、王正緒，2014)。因此，通過納入個體政治參與的行為數據，我們可以更為有效地測量社會資本這一政治社會化因素對公眾政府信任的影響。除此之外，在社會資本範式的政府信任研究中，政治效能感和社會信任水平亦是兩個重要的解釋變量。

### 媒介接觸論：政府信任來源的第三種解釋

除了制度理論和文化生成論，在政治傳播領域中，媒介接觸/使用是一個被廣泛證實的解釋政治信任的重要變量(彭芸，2004；劉嘉薇，2006；McLeod, 2000)。Chaffee、Ward與Tipton(1970)最先證實大眾傳播媒介之於個體政治社會化的重要作用；此後，大量研究從媒介內容——如框架理論(馬得勇，2016)和涵化理論(Lichter, Lichter & Amundson, 1999)、媒介類型(Becker & Whitney, 1980; Hetherington, 1998; Moy & Pfau, 2000)以及媒介信任(劉嘉薇、黃紀，2010；Miller & Krosnick, 2000)等角度出發，分別探討上述不同的媒介維度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儘管許多政治學者承認傳播媒介是政治系統和社會公眾溝通的重要橋樑(胡榮、莊思薇，2017)，但媒介尚未成為他們政治信任研究中的重要解釋變量。

本文認為，媒介應被視為與制度和文化範式相提並論且互為補充的、解釋政府信任來源的核心因素；媒介對個體政府信任的形成及塑造機制是制度和文化解釋路徑無法涵蓋的。從制度主義路徑來看，其最大的不足在於忽略了公眾感知政府績效的媒介途徑。例如Chanley等(2000)的研究發現，國會和政府的行為通常在新聞報道(醜聞)中得以曝光，而對這些醜聞加以報道的媒體恰恰是影響人們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王磊(2017)指出，中國的宏觀經濟績效依託於國家資源分配和傳播系統的象徵性調節進行合法性的生產。可見，媒體通過對政府行為和績效的報道，不僅為公眾提供了「曝光效應」或「直接的認知效果」，更構築了公眾頭腦中的政治世界(張明新、劉偉，2014)。至於文化主義的觀點，它雖認識到各種內化的價值觀對個體政府信任的影響，卻忽視了媒體對大眾觀念和群體文化的塑造作用(施從美、江亞洲，2017)。社會資本視角雖然強調了人際關係網絡中的信息傳播，但並未充分認識到互聯網對人際關係網絡的影響；此外，個體通過線下人際網絡所獲取的信息極其有限，其數量和規模與媒介所提供的信息無法比擬(盧春天、權小娟，2015)。本質而言，信任作為一種主觀認知和感受，亦是人們的一種積極性預期；施信者的信任依賴於信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信息充分能夠增加博弈和交換中的信任關係(鄒宇春、敖丹、李建棟, 2012)。因而總體觀之, 媒介提供了海量的政治資訊, 媒介化的政治信息同時極大降低了信息交流和互相監督的「交易成本」(陳福平, 2012), 進而對個體政府信任水平產生深刻的影響。

隨著互聯網的深入普及, 網絡已然促成了「虛擬政體」(virtual polis)和「新媒介政治」(new media politics)(呂傑華, 2011), 極大地改變了政治傳播生態。在這一背景下, 互聯網成為公眾政治信任的重要來源, 越來越多的政治和傳播領域的學者開始探討互聯網與政治信任的關係(Lei, 2011; Lu, 2013; Stockmann & Gallagher, 2011; Zhu, Lu, & Shi, 2013)。在網絡時代, 威權國家不會完全控制政治信息的傳播, 微博、博客、論壇等網絡平台為其提供了新的渠道; 當傳統媒體刻意對一些信息選擇性隱匿時, 公眾便會更加依賴網絡媒體等非正式渠道獲取相關信息(馬得勇、王麗娜, 2015)。由此, 公眾的日常上網行為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化的行動。通過「無形的滑鼠」(invisible mouse), 公眾充分享受到網絡所提供的三重機制: 信息傳播、互動表達和公共參與(張明新、劉偉, 2014)。所謂信息傳播機制, 是指互聯網「打破了政治傳播系統的封閉性, 減少傳播層級, 提高透明度」(潘祥輝, 2011: 36), 壓縮了政治認知的交易成本, 進而為公眾提供評價政府績效的必要信息。與此同時, 互聯網拓寬了政治互動和表達的空間, 既對威權主義價值觀產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又提升了公眾的政治效能感(章秀英、戴春林, 2014)。此外, 網絡的公共參與機制促進個體參與並介入公共事務, 從而創造出大規模的社會參與及集體社會資本(Thurlow, Lengel, & Tomic, 2004)。

綜上, 我們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 RQ1:

**RQ1a:** 互聯網是否已經成為影響公眾對政府信任的一個重要因素?

**RQ1b:** 是否互聯網使用與制度、文化和社會資本存在相互作用, 共同影響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有大量研究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檢驗互聯網使用對政治信任的影響。目前, 針對西方社會的研究存在較大的爭議, 譬如有的學者發現互聯網使用與政治信任呈現正相關關係(Bailard, 2012), 而有的則認為互聯網使用「解構」了公眾的政府信任(Im, Cho, Porumbescu, & Park,

2014)。在本土研究中，總體上發現網絡媒介對政治信任主要呈現負向作用(程中興、廖福崇，2017；Tang, Zhang, & Martin, 2016)。

基於此，我們提出研究假設H1：

**H1：互聯網使用負向影響公眾政府信任水平。**

### 互聯網效應估計中的內生性問題

陳雲松、賀光燁與吳賽爾(2017)指出，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內生性(endogeneity)問題一直是懸在因果推斷頭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所謂內生性，是指在估計迴歸方程時，模型中的一個或多個解釋變量與隨機擾動項相關，從而導致參數估計出現了偏誤(Cameron & Trivedi, 2005)。可以說，社會科學定量分析的本質是排除競爭性解釋(將其作為控制變量)，然而任何一個模型都不能做到「窮舉」，因此遺漏的競爭性解釋因子便會成為內生的，從而失去因果解釋力(陳雲松、吳曉剛，2012)。本質而言，內生性問題主要包括「聯立性偏誤」(simultaneity bias)、「自我選擇偏誤」(self-selection bias)、「樣本選擇偏誤」(sample-selection bias)以及「遺漏變量偏誤」(omitted-variable bias)四個方面(陳雲松、范曉光，2010)。

鮮有傳播學學者關注到內生性問題。事實上，在估計互聯網效應時，研究者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聯立性偏誤，即「雙向因果」問題。例如，陳雲松(2013)發現互聯網使用與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之間的「抑制性雙向因果」關係。通過對比OLS及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迴歸結果，他發現互聯網的效應由於內生性問題而被極大地低估。Tang等(2016)使用IV方法證實互聯網使用和政治態度的雙向因果關係。無獨有偶，有學者發現若不考慮雙向因果問題，互聯網對政治信任的解構效應被低估了近兩倍(程中興、廖福崇，2017)。此外在一項關係資本與政治信任的研究中，研究者亦發現政府信任與飲食社交的雙向因果關係，IV迴歸顯示的估計係數是OLS迴歸係數的五倍(陳雲松、邊燕傑，2015)。基於此，我們認為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可能存在某種「互構」機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除了聯立性偏誤，自我選擇偏誤的存在為互聯網效應的有偏估計添加了另一種可能性。造成這一估計偏誤的實質在於，上網行為為本身就不是一個隨機行為，它是不同人群自選擇的結果；這些個體異質性(heterogeneity)因素可能同時影響因變量(政府信任)——即使不對因變量產生影響，傳統OLS迴歸分析得到的參數估計也會混雜著這些混淆變量的效應，從而產生估算偏誤。第一道數字鴻溝研究已經證實，年齡、受教育程度、性別、收入、職業、地區等人口與社會經濟特徵的差異是產生互聯網接入溝(physical access gap)的重要原因(DiMaggio & Hargittai, 2001; Wei & Hindman, 2011; Willis & Tranter, 2006; Zhang, 2013)，而這些差異對政府信任也產生影響(盧春天、權小娟，2015；薛可、余來輝、餘明陽，2017)。以年齡為例，年輕的公眾更傾向於使用網絡獲取信息，而該群體可能因為本身帶有更弱的威權主義價值觀而呈現較低的政府信任水平，由此互聯網對政府信任的效應就被「抑制」了，導致學者難以對其真實效應進行準確的觀測和計算。對於這種情況引發的內生性問題，較為便捷和有效的應對方法是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採用該方法以儘可能排除自我選擇偏誤(季程遠、王衡、顧昕，2016；馬得勇、王麗娜，2016；趙曉航、李建新，2017；DiMaggio & Bonikowski, 2008)。

綜上，本文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RQ2：

**RQ2a：**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是否存在雙向因果關係(互構)，從而影響了對互聯網真實效應的估計？

**RQ2b：**互聯網使用否存在自我選擇偏誤，從而影響了對互聯網真實效應的估計？

## 數據與模型

本文數據來自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該調查採用多階分層概率抽樣設計，覆蓋中國大陸所有省級行政單位，對中國100個縣(區)、480個居(村)民委員會、1.2萬戶家庭中的個人進行了調查。調查總樣本量為12,000，最終有效樣本為11,785個。考慮到

18歲以下未成年人及65歲以上的中老年群體可能由於缺乏數字技術知識和使用技能而較少使用互聯網，我們僅選取年齡為18–65歲的樣本，在剔除相關重要變量存在缺失的樣本後，本研究使用的有效樣本為9,936個。

## 模型設置

### I. 自我選擇偏誤的處理

由於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可能存在自我選擇偏誤，我們首先採用傾向值方法對其進行控制。傾向值，即在給定一系列協變量或混淆變量 (confounding variables) 的情況下，個體接受處理變量特定取值水平影響的條件概率 (Rosenbaum & Rubin, 1983)。本研究的處理變量「互聯網使用頻率」有五個水平 (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我們採用傳統的傾向值方法，將其轉換為二分變量，計算每個個體的互聯網接入得分。計算公式如下：

$$p(X) = \Pr [D = 1|X] = E [D|X] \quad (1)$$

式(1)中， $X$ 代表由一系列可觀測到的協變量組成的向量。根據文獻綜述部分提及的產生互聯網接入溝的因素，我們選取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戶口、黨員身份、職業、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父親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和幸福感受為估算傾向得分的協變量。 $D$ 表示處理變量，即是否接入互聯網，1表示是互聯網使用者 (干預組)，0表示非互聯網使用者 (控制組)。本研究使用Probit模型計算得出每一個個體的傾向值得分 $p(X_i)$ ，即個體接入互聯網的理論概率。得到傾向值後，我們對得分相似的個體進行「配對」——例如，一種最為便捷的方法就是找到傾向值分數相同 (或相似) 的分別位於干預組和控制組中的兩個個體，將其進行「干預—控制」匹配——並得到配對後的樣本。由於匹配的前提是個體傾向值在「共同支持域」(common support region) 中，因此分極端的個體將得不到匹配而被刪除。我們最終得到匹配樣本數8,725個。<sup>3</sup>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 II. 聯立性偏誤的控制

本文基於控制自我選擇偏誤後的匹配樣本進行工具變量迴歸，以驗證及處理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潛在的聯立性偏誤。

首先，建立預測個體政府信任水平OLS模型。方程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T_i + \beta_2 Z_i + \beta_3 W_i + \beta_4 S_i + \beta_5 X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式(2)中， $Y_i$ 表示*i*個體的政府信任水平， $T_i$ 表示*i*個體的互聯網使用頻率(五個水平)， $Z_i$ 是個體對制度績效的感知， $W_i$ 表示個體的文化變量， $S_i$ 代表個體的社會資本變量， $X_i$ 是個體一系列控制變量。由於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可能存在聯立性偏誤，即 $\text{Cov}(T_i, \varepsilon_i) \neq 0$ ，因此式(2)計算的結果會存在偏誤。基於此，我們建立工具變量迴歸模型，用以下方程組表示：

$$Y_i = \beta_0 + \beta_1 T_i + \beta_2 Z_i + \beta_3 W_i + \beta_4 S_i + \beta_5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T_i = \gamma_0 + \gamma_1 V_i + \gamma_2 X_i + \zeta \quad (4)$$

式(4)中， $V_i$ 代表工具變量組成的向量， $\zeta$ 是隨機擾動項。該方程組成立的條件是 $\text{Cov}(V_i, \varepsilon_i) = 0$ ， $\text{Cov}(\zeta, \varepsilon_i) = 0$ ，且 $\text{Cov}(V_i, T_i) \neq 0$ ；也就是說，工具變量作為模型之外的衝擊，僅能通過主解釋變量(互聯網使用頻率)影響政府信任，由此得出的 $\beta_1$ 才是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真實效應。

本研究採用兩階段最小二乘迴歸(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法，首先對方程(4)進行迴歸，得到 $T_i$ 的預測值 $\hat{T}_i$ ；然後將 $\hat{T}_i$ 代入方程(3)替代並進行迴歸。

## 變量測量

**因變量。**本研究的因變量是政府信任。參照胡榮、莊思薇(2017)，本研究選取「層級信任測量」的方法，將政府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維度。問卷利用5級里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1 = 完全不可信, 5 = 完全可信)分別詢問被訪者對中央政府(平均數 = 4.33, 標準差 = 0.81)和地方政府(平均數 = 3.64, 標準差 = 1.09)的信任程度。統計

結果表明了中國大陸「央強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羅家德、帥滿、楊鯤昊, 2017)。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居民對政府的總體信任, 因此通過主成分法將2道題項進行因子分析, 析出單個「總體政府信任」因子, 使用其因子得分作為居民總體政府信任的程度。

**主解釋變量。**本研究主要自變量為互聯網使用頻率。問卷對被訪者「過去一年對互聯網(包括手機上網)」的使用情況進行5級量表的定序測量(1 = 從不, 5 = 總是)。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 被訪者的互聯網使用頻率較低(平均數 = 2.07, 標準差 = 1.48), 且有近60.63%的被訪者未接入互聯網。這一結果表明本研究通過傾向值匹配克服選擇性偏誤的重要性。

**其他解釋變量。**根據文獻綜述, 公眾政府信任的來源主要包括制度、文化以及社會資本三大因素; 本研究一同將其作為自變量納入模型, 以比較它們與互聯網使用之於政府信任的相對重要性。根據胡榮等人(2011)的研究, 本文的制度(績效)因素主要測量公眾對政府績效的主觀感知, 包括經濟績效、政治績效和社會績效三個維度。其中, 公平感(平均數 = 2.83, 標準差 = 1.20)是經濟績效的代理變量, 詢問被訪者主觀感知到的收入公平程度; 幸福感(平均數 = 3.75, 標準差 = 0.88)作為政府政治績效的代理變量, 兩者均使用5級量表進行定序衡量; 相對剝奪感(平均數 = 4.05, 標準差 = 1.71)則是作為對社會績效的測定, 衡量被訪者主觀階層認定的結果(被訪者需要在一個10級量表上選擇目前自己所處的社會層級, 數值越大表明越在社會頂層)。此外, 參照盛智明(2013), 我們將「感知社會流動」和「預期社會流動」納入制度因素中。CGSS2010問卷不僅詢問了目前自己所處的社會等級, 還詢問了10年前與10年後的社會等級。感知社會流動變量的建構為當前與10年前自身所處社會層級評分的差值, 若數值為負, 則賦值1; 若數值為0, 則賦值2; 正值則賦值3。預期社會流動採取類似的指標建構方法。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明, 分別有53.38%和66.23%的被訪者認為自己經歷了向上的社會流動以及預期會向上流動。

本研究採用的文化變量是「威權價值觀」。我們使用問卷中的3道題測量被訪者的威權主義傾向: 「對於『領導送溫暖』等舉動, 老百姓應該感激」、「老百姓應該服從政府」和「如果政府侵佔了我個人的利益,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我只能忍了」。答案根據5級量表設計(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通過因子分析提取了「威權價值觀」因子，將其得分作為威權主義程度。

對於社會資本因素，我們納入普遍信任、外在政治效能感、內在政治效能感、社區投票和政治參與五個變量。其中普遍信任(平均數 = 3.47，標準差 = 1.10)為被訪者對社會上陌生人的信任水平(1 = 完全不信任，5 = 完全信任)。政治效能感的測量由一個包含11道題項的5級量表組成，通過因子分析析出「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內在政治效能感」兩個因子，將其因子得分作為個體政治效能感的強弱程度。社區投票根據「近三年，您是否在居(村)委會的換屆選舉中投過票？」一題測量，52.76%的被訪者曾在過去三年參與過社區選舉投票。政治參與通過包含7道題項的量表測量，通過因子分析合成「政治參與」指數(因子得分)。

**控制變量。**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男性47.63%)、年齡(平均數 = 43.76，標準差 = 12.22)、受教育年限(平均數 = 9.28，標準差 = 4.34)、戶口(城市居民52.29%)、職業類型(從未工作、務農、自雇職業、企業職工、政府機關工作和其他)、黨員身份(黨員10.98%)、宗教信仰(信教12.07%)以及曾遭遇政府有關部門或工作人員的不公正對待(9.73%)。此外，在本土研究中，傳統媒體由於「黨媒姓黨」和「講政治」的原則，而被普遍證實對公眾的政府信任水平具有積極的建構效應(胡榮、莊思薇，2017；程中興、廖福崇，2017)，我們因此將公眾的報紙瀏覽(平均數 = 2.28，標準差 = 1.29)和電視觀看(平均數 = 4.13，標準差 = 0.93)頻率加以控制。

### 工具變量選擇

工具變量的引入需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解釋變量首先滿足內生變量的前提；其次，選取的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具有相關性；第三是外生性或「排他性約束」，表明引入的工具變量與擾動項不相關(陳強，2014)。

我們首先對條件一進行內生性檢驗，證實互聯網使用是一個內生變量，需要引入工具變量。受到先前研究的啟發（陳雲松，2013；程中興、廖福崇，2017；Tang et al., 2016），筆者採用「電腦使用偏好」作為本研究的工具變量，將其操作化為兩個變量——「家庭購買的電腦數量」和「2000年或2005年擁有電腦」。<sup>4</sup> 其中「家庭購買的電腦數量」（平均數 = 0.61，標準差 = 0.94）為直接測量；「2000年或2005年擁有電腦」根據其最近購買電腦的時間進行折算，若其在2000年以前購買電腦（佔比1.97%），則編碼3，2001–2005年購買電腦（佔比8.07%），則編碼2，2006年以後購買或至今未購買電腦（佔比89.96%），則編碼1。

從相關性條件來看，理論上講，家庭購買電腦數量越多、越早購買電腦的人，其使用互聯網的程度會愈深入。相關分析顯示，「家庭購買電腦數量」與互聯網使用頻率的Pearson相關係數為.55 ( $p < .001$ )，「2000年或2005年擁有電腦」與互聯網使用頻率的Spearman相關係數為.22 ( $p < .001$ )。這一結果說明本研究選取的兩個變量不存在識別不足問題。此外，我們通過弱工具變量檢驗（Stock & Yogo, 2005）進一步證明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條件。

從外生性條件出發，一方面由於我們選定的變量為滯後變量，它的取值已經固定，很可能與當期的擾動項無關；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消費行為或個人異質性偏好，它在邏輯上與公眾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存在關聯——即使選取的變量可能「膨脹」了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被訪者，而經濟條件又會影響其政府信任水平；但通過控制相關變量，由工具變量引入的可能性遺漏變量進而產生的偏誤便會得到較好地控制。另外，本研究也通過事後判別（post-hoc analysis）分析，驗證了工具變量的外生性。

總體上看，本研究所選取的工具變量，從理論、邏輯、相關研究實踐積累的經驗以及統計檢驗結果上來說，都是有效的。<sup>5</sup>

## 實證結果與分析

前文提及，由於個體在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上的異質性，他們接入互聯網的可能性存在很大的差異，這會導致在估算互聯網使用對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府信任的影響時，由於潛在的自我選擇偏誤問題而產生有偏估計(RQ2b)。為此，我們首先對原樣本進行傾向值匹配，利用原樣本和匹配後樣本進行OLS(即方程2)擬合。通過對比表一的模型1(原樣本OLS)和模型6(匹配樣本OLS)，我們發現互聯網使用頻率的迴歸係數相差無幾，在四捨五入後均為-0.6( $p < .001$ )，研究假設H1(互聯網使用負向影響公眾政府信任水平)得到證實。同時，仔細對比兩模型各項迴歸係數可以發現：模型1中互聯網使用的迴歸係數略微大於模型6；其他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方向和模式上不存在太大差異，且匹配樣本迴歸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游宇、王正緒，2014；盧春天、權小娟，2015；薛可、余來輝、餘明陽，2017)基本相同。這說明利用原樣本進行OLS進行迴歸會略微高估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基於此，我們認為互聯網使用的自我選擇偏誤是存在的，但其對總體結果的影響並不大，RQ2b得到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初步研究結果——原樣本和匹配樣本OLS迴歸結果在各變量的影響模式和效應大小上基本一致——是符合預期的，因為前人研究同樣顯示匹配前後的迴歸結果差異不大。儘管如此，正如胡安寧(2015)指出的那樣，「基於傾向值匹配得到的結論一般而言要比傳統統計分析技術得到的結論具有更高的內在信度」，它「保證了研究者進行因果推論的可能性」。因此，後續的分析將建立在匹配樣本的基礎上。

為了解答RQ1a，我們基於匹配樣本對方程(2)進行層次迴歸分析，將控制變量放入第一層，互聯網使用頻率、制度、文化、社會資本等變量相繼放入第二、三、四、五層，形成表一的模型2-6。從模型擬合結果來看，加入不同層次的變量後，模型的整體解釋力(Adjusted  $R^2$ )逐漸加強，從7%增加到19%，增加Adjusted  $R^2$ 數據表明各變量對模型的解釋力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另外模型6顯示，多數制度、文化和社會資本變量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均大於互聯網使用頻率係數的絕對值，尤其是威權價值觀( $\beta = .20, p < .001$ )積極顯著地影響政府信任水平，其效應幾乎是互聯網效應(絕對值)的8.5倍(基於非標準化迴歸係數計算)。基於上述結果，似乎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釋力很弱。然而由於可能存在聯立性偏誤，互聯網的真實效應或許被「抑

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制」了。因此，我們引入工具變量對方程(3)和(4)迴歸，檢驗我們得到的結果是否穩健。

表一 互聯網使用頻率影響政府信任的OLS及IV-2SLS模型<sup>a</sup>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互聯網使用頻率	-.06*** <sup>b</sup>		-.08***	-.10***	-.07***	-.06*** <sup>b</sup>	-.16***
<b>制度(績效)變量</b>							
幸福感	.07***			.10***	.10***	.07***	.07***
公平感	.09***			.13***	.12***	.09***	.10***
相對剝奪感	.00			.02	.02	.01	.02
感知社會流動	.02			.02	.01	.01	.01
預期社會流動	.03**			.04**	.04**	.03**	.02*
<b>文化變量</b>							
威權價值觀	.20***				.22***	.20***	.19***
<b>社會資本變量</b>							
普遍信任	.12***					.12***	.12***
外在政治效能感	.15***					.14***	.14***
內在政治效能感	-.05***					-.04***	-.04**
社區投票	.05***					.05***	.05***
政治參與	-.03**					-.03**	-.04**
截距	-.62***	.79***	.85***	.13	.06	-.55***	-.45**
Adjusted $R^2$	.20	.07	.07	.11	.15	.19	.18
Adjusted $R^2$ change			.00*** <sup>c</sup>	.04***	.04***	.04***	
<i>N</i>	9,927				8,725		

註：a. 不同模型均納入全部控制變量，由於控制變量的估計係數和顯著性測試結果幾乎沒有變化，出於簡約性考量，控制變量估計係數省略顯示；表格中的係數為標準化係數；b. 由於四捨五入，模型1和6的互聯網使用頻率的係數顯示相同，但實際上兩者存在略微差異，其中模型1中的係數為-.064，模型6為-.057；c. 原數值為.004。\*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表一的模型7為IV-2SLS結果。<sup>6</sup>根據模型7，互聯網使用頻率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為-.16 ( $p < .001$ )，相比模型6中的係數，幾乎增加了3倍(基於非標準化迴歸係數計算)。換言之，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在OLS模型中被極大地低估了。此外，互聯網使用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小於威權價值觀( $\beta = .19, p < .001$ )，但大於普遍信任( $\beta = .12, p < .001$ )和公平感( $\beta = .10, p < .001$ )等社會資本和制度績效變量的效應，這說明互聯網使用已經成為政府信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源(RQ1a)。通過對比模型7和模型6，我們發現制度、文化和社會資本變量的係數和影響模式幾乎沒有發生變化，這再一次說明聯立性偏誤對互聯網的真實解構效應存在抑制作用(RQ2a)。

此外，上述結果亦證實模型6中制度、文化和社會資本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結果是穩健的，為我們通過模型2-6考察RQ1b提供了契機。我們發現加入制度變量後，互聯網使用的解構效應進一步增強；加入文化變量後，互聯網的解構效應受到「沖刷」和「緩衝」，降低至-0.07；在進一步加入社會資本變量後，互聯網對政府信任的負影響得到進一步緩解，其解構效應變為-0.06。該結果表明：單一的互聯網因素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是有限的，互聯網與制度、文化和社會因素存在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了公眾的政府信任水平(RQ1b)。

## 討論

本研究的出發點在於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的內生性問題遮蔽了對真實媒介效應的估計。基於CGSS2010數據，通過採用PSM和IV-2SLS等助益於處理內生性偏誤的統計模型，本文估算並證實互聯網使用對公眾感知政府信任具有較強的因果性。不限於此，本節將深入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內生性視角究竟能為我們後續探尋和理解公眾互聯網使用影響政府信任的社會性機制帶來怎樣的啟示？

可以說，程中興與廖福崇(2017)探討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雙向因果關係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起點。然而，該研究在方法及社會機制的闡釋和發現上存在些許不足，進而遮蔽了理論發展和創新的可能性。從方法層面來說，該研究未能將產生內生性問題的其他類型偏誤納入研究範疇。根據文獻綜述，在估計互聯網效應時，自我選擇偏誤亦是產生真實效應估計偏差的重要來源。由於個體異質性的存在，人們在接入互聯網的決策及使用程度上並非均質，而是一種自我選擇行為。這種選擇性，一方面可能源於可觀察到的異質性(如年齡、收入等)，也可能來自一些無法直接觀測的因素。因此在估計互聯網效應時，我們必須將選擇性問題考慮在內。本研究通過傾向值匹配儘可能地控制了異質性因素的潛在影響，並證實這種自我選擇偏誤的存在。

在互聯網使用影響政府信任的社會機制的闡釋和解讀上，本文部分贊同前人提出的「媒體抑鬱論」(media malaise) (Robinson, 1976) 和「新媒體抑鬱論」(盧春龍、嚴挺, 2015)。根據媒體抑鬱論，現代傳媒的商業化競爭使得新聞集中在負面報道，尤其是政治醜聞的曝光強化了民眾的政治不滿、政治冷漠、政治疏離、政治犬儒主義以及政治不信任等負向態度。當下，網絡媒體「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抑鬱』的方式(如網絡防腐)曝光了地方政府的負面消息」(程中興、廖福崇, 2017)；由於網絡具有良好的「互動性」和「去中心性」，打破了由官方媒體自上而下單向傳遞的政治傳播格局及傳統的政治社會化路徑，形變成為一種「受眾主導」的多中心、多元化的網絡發散性結構。在這樣一個看似扁平的結構中，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基於『情感化真相』的擬態環境」(史安斌、楊雲康, 2017)，它的出現同時造成了信息傳播的「窄化」(韓娜, 2015)，更為嚴重的是產生了「不對稱極化」現象，直接瓦解了「(網絡)民主化的公共領域」(史安斌、楊雲康, 2017)。此外，進入社會化媒體時代，推薦機制和算法確認會迎合用戶的信息偏好，使得他們陷入一個「自我增強循環」中，從而無形中產生一種關於現實和社會的「虛假意識形態」而不自知。由此，一些有關政府負面的信息一經傳播便會被放大且迅速形成社會傳染(social contagion)，大大強化了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或「抑鬱」效應。

然而，上述機制或許僅能在一般社會性層面上具有解釋力，由於異質性的存在，其解釋效力在不同群體中可能存在差異。本文所採用的IV-2SLS模型為探討該問題提供了契機。儘管在上文「模型設置」部分我們已經基於理論論辯、前人研究經驗以及通過事後判別驗證並證實本文所選取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及外生性，但必須承認的是：工具變量迴歸建立在一個強假設的基礎之上，即工具變量對內生解釋變量(互聯網使用)的效應是均質的。實際上，不同群體的異質性往往導致樣本對於外生衝擊的反應步調並不一致(陳雲松, 2012; Xie, 2007)。如果拋開這一假設，即承認本研究的工具變量「電腦使用偏好」對人們使用互聯網的影響是異質的，那麼工具變量估計量應該更多地反映了具有更高「電腦使用偏好」的樣本上，其值所體現的就不是基於樣本的總體平均干預(互聯網使用)效應，而是一個加權平均值。<sup>7</sup>這在工具變量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析中被稱為「局部平均干預效應」(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問題(陳雲松, 2012)。如是, 我們大膽揣測一種可能的情形: 偏好使用電腦的個體更傾向於使用互聯網, 形成群體間互聯網使用上的馬太效應;<sup>8</sup> 同時, 電腦使用偏好越強的個體更容易對網絡形成媒介依賴(偏向使用互聯網獲取信息), 而媒介依賴一方面可能直接對政府信任產生負面效應, 另一方面會強化個體對互聯網的使用, 從而間接「解構」個體的政府信任水平。如此, 我們引入工具變量的過程無意中「膨脹」了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

為了驗證潛在的LATE現象, 我們在初始模型的基礎上納入「網絡依賴」變量,<sup>9</sup> 同時將匹配樣本根據「是否使用互聯網」和「網絡依賴」切分成不同子樣本, 分別擬合IV-2SLS模型。具體結果見表二。

為了便於比較控制網絡依賴後模型估計值的變化, 我們將模型7(未控制網絡依賴)的主要估計結果列入表二。結果顯示: 相較於模型7, 控制了網絡依賴後的各模型中互聯網使用效應估計值均產生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保持統計上的顯著性; 網絡依賴變量在各模型中均對政府信任產生「解構」效應。對比模型C1和C2, 我們發現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在使用並依賴互聯網為主要信息來源的子樣本中遠強於使用卻不依賴網絡獲取信息的子樣本; 此外, 模型C1中的互

表二 控制「網絡依賴」後的IV-2SLS結果

	使用互聯網樣本				
	全樣本		使用互聯網樣本	依賴互聯網獲取 信息樣本	依賴其他媒體獲 取信息樣本
	模型7	模型A	模型B	模型C1	模型C2
互聯網使用頻率	-.16***	-.15***	-.12***	-.14***	-.08*
網絡依賴	未控制	-.03*	-.02	已分組控制	
截距	-.45**	-.44**	-.45**	-.84*	-.96**
N	8,725	8,717	3,260	1,157	2,103
Adjusted R <sup>2</sup>	.18	.19	.20	.21	.20

註: 上述模型均納入所有控制變量; 係數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聯網使用效應強於模型B的估計值。概言之，上述結果證實了強電腦使用偏好樣本的LATE問題是存在的。同時，這也映射出過往研究對互聯網使用影響政府信任的社會性機制的揭示不足，即網絡依賴作為互聯網使用的重要維度之一在過往政府信任影響研究中鮮有涉及(姚君喜，2014)。更為重要的是，偏好依賴網絡獲取信息的個體相較於偏好通過其他媒體獲得信息的個體，更容易通過使用互聯網從而降低其對政府的信任水平。<sup>10</sup>可以說，通過對工具變量引發的LATE問題進行剖析，我們的發現揭示出重要的政策意涵(如何對重度網絡依賴者進行有效地傳播以培育和提升該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同時具備理論上的價值(在未來的研究中應更加關注不同群體間異質化的媒介使用效果)。

上述分析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指向互聯網使用的獨立效應，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網絡接觸僅是產生公眾政府信任的其中一種渠道，且其影響效應和機制是有條件的。具體來講，通過層次迴歸分析，我們發現在加入制度績效、文化和社會資本等不同層次的變量後，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或「強化」或遭受「沖刷」)。我們進一步驗證潛在的調節效應和中介效應。事後檢驗結果表明，制度績效因素中的幸福感和公平感、作為文化因素的威權價值觀以及社會資本因素中的社區投票變量部分中介了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效應。同時，威權價值觀亦是一個調節變量，它們與互聯網使用變量的交互項積極顯著地影響政府信任水平。這些結果均說明互聯網使用與其他政府信任的來源因素互相塑造並共同影響個人的政府信任水平。<sup>11</sup>

在政府信任對互聯網使用的反向因果關係識別和驗證上，我們人為地將互聯網使用和政府信任進行自變量和因變量的「轉置」(switch)，並執行迴歸分析。分析結果表明政府信任對互聯網使用具有顯著的負向效應，這一反向因果機制的存在或許抵消(offset)了一部分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也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OLS估計的互聯網使用效應較工具變量估計結果被低估了3倍。結合上文發現的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我們可以證實二者間雙向因果機制的存在：公眾的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其政府信任水平越低；而政府信任水平越高，其互聯網使用相應受到了「抑制」。我們稱這種現象為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公眾對互聯網解構效應的「自主性免疫」。事實上，這一發現與陳雲松(2013)提出的「抑制性雙向因果」觀點不謀而合——在其研究中，互聯網使用可以擴大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但參與行動後則因為種種原因，反而會減少相應的互聯網使用。我們認為，這種免疫效應產生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公眾主動迴避或「選擇性接觸」的結果，另一方面或許體現了公共議程設置的「外壓模式」(王紹光，2008)。值得說明的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免疫效應的背面——公眾的政府信任程度越低，則可能越頻繁地使用互聯網獲取信息——直觀地體現出互聯網潛在的建構作用。有學者(汪玉凱，2015)指出，網絡媒體(微博)對政府行為和公權力的監督，促進了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以及政府行為的規範性；更進一步，公眾在網絡上與官員進行線上溝通、網絡問政、線上監督、網絡信訪和結社等方式，充分激發了公眾參與政治的積極性和政治興趣，拓展了政治參與的規模，並形成了一種表達性政治參與，進而提升公民精神、孕育政治信任(張明新、劉偉，2014)。因此，我們不應過於悲觀地看待互聯網的解構效應，而是應該肯定其對於個人政治社會化、政府公共管理和優化決策機制的積極作用。

## 結論

本研究從內生性視角切入，估計和探討公眾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真實效應。主要研究發現和結論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互聯網使用的自我選擇偏誤、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的聯立性偏誤是存在的，這使得通過傳統OLS迴歸估計互聯網使用效果會產生嚴重的偏差。與傳統迴歸結果相比，工具變量迴歸中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係數大約是前者的4.01倍，互聯網的解構效應在傳統OLS迴歸分析中被極大地低估了。

其次，「媒介接觸論」已經成為繼制度範式和文化範式後，解釋政府信任來源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路徑/視角。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效應大小，已經超過了大部分的制度績效、文化和社會資本因素。然而，互聯網使用帶來的政府信任效應同時受到制度績效、文化價值觀以及社會資本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或建立了一種「橋樑」(中介作

用)，或產生了調節作用，這說明互聯網使用影響個體政府信任的機制具有高度複雜性。

最後，本研究再一次證實，制度績效、文化以及社會資本因素對於政府信任的形成具有良好的解釋效力；在互聯網時代，這些因素仍是政府信任的重要來源。在這些因素中，大部分變量對公眾的政府信任水平具有顯著的建構效應。其中，威權主義價值觀對政府信任的建構效應最高，它不僅作為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變量，削弱了互聯網使用的解構效應，而且顯著正向調節了這一解構效應。可以說，威權主義價值觀已然成為了互聯網時代政府信任的一個「安全閥」和「緩衝區」。

本文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將互聯網視為影響政府信任來源的重要因素，並估算了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真實影響。同時，本研究還從方法上梳理、並通過嚴格的計量模型證實了互聯網效應估計中存在的兩類內生性問題：自我選擇偏誤與聯立性偏誤。

在結束本文之前，必須指出兩個對本研究結論有效性的潛在威脅。其中最大的威脅在於工具變量的完全外生性較難保證。可以說，把模型之外的工具變量引入模型，儘管為因果模型識別增加了有效信息，但帶來了噪音——這直接成為本研究的一個「軟肋」。然而筆者認為這不應該成為批判甚至拒絕工具變量分析的理由。誠如陳雲松（2012：211）所言，「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定量分析方法都基於諸多強假設…但工具變量的外生性作為一個工作假設，哪怕已經有充分的直覺、理論和實證支持，但卻因為直接進入了分析過程之中而顯得格外扎眼」；即使是最簡單的OLS多元線性迴歸，大多數的研究者也往往選擇將迴歸分析的五個基礎假設拋諸腦後轉而直接進行模型的擬合。相比之下，工具變量分析從被提出伊始便背負著「探尋社會中的因果關係」的「初衷」和「使命」，已經把「社會科學的精確化」的目標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由此，針對工具變量分析「方法論上的困難可以通過方法的改進得以克服，但如果因為方法上的不足而放棄一整套分析問題的思路，就會變成因小失大。」（胡安寧，2019：207）此外，具體到本研究，筆者認為工具變量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件「盔甲」。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已儘可能地論證和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和外生性，更是源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對工具變量引起的LATE的細化分析——它為我們帶來了對互聯網使用影響政府信任的社會機制的深刻認識。至少我們可以確認，網絡使用對於具有較強電腦使用偏好的個體來說，(部分因為他們更依賴互聯網獲取信息)具有更強的政府信任「解構」效應；同時這也啟示研究者要重視個體異質性導致的異質化媒介效果。

第二個威脅在於：本研究建立在二手數據的基礎上，一方面該數據過於陳舊，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們對某些變量的操作化。就前者而言，2010年CGSS調查未能囊括公眾微博、微信等社會化媒體的使用數據。儘管現實情況是：其時社交媒體在中國大陸尚不夠風行，公眾通過互聯網進行的信息消費(尤其是新聞消費)的「入口」主要還是基於「大眾門戶」(如傳統新聞門戶網站)，尚未轉換到個性化和社會化的「個人門戶」(彭蘭，2012)。因此，我們的研究確實未能充分體現「微博元年」(尤其是2011年「中國政務微博元年」)至今社交媒體對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將本研究結果推論到當下情境的可能性。就變量操作化來說，由於數據所限，網絡使用僅通過「使用頻率」進行測量，我們沒有也無法採用實質性的互聯網使用(如具體的互聯網使用時間以及更為精細的互聯網政治性使用)進行度量。此外，我們並未找到更好的指標測量經濟和政治績效，而是採用收入公平感和幸福感進行代理測量。筆者承認上述兩個數據問題是本研究的天然「缺陷」，但必須指出，這一數據在現階段條件下具有不可替代性且與本研究設計最為適配。首先，CGSS作為中國大陸最早的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和公開的學術調查項目，其樣本最具代表性和權威性；其次，從目前已開放的CGSS調查數據來看，最近的調查中僅有2010年數據直接測量公眾對政府的機構信任。更為重要的是，CGSS項目系統、全面地收集社會、社區、家庭、個人多個層次的數據，涵蓋了豐富的不同主題的調查模塊，這為本文兩個工具變量的選取提供了可供選擇的餘地——否則，本研究的具體設計就會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境地。

可以預見，隨著社會化媒體的使用程度不斷加深，其在政治信息傳播上的應用亦日趨深入，對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影響愈發明顯。公民的微信、微博等社會化媒體的政治性使用對政府信任的真實效應及

作用機制將是一個值得持續探討和檢驗的問題。筆者就此倡導後續的研究能夠運用更加精細化的測量對該議題進行「複製性研究」(replication study)。

## 註釋

- 1 「塔西佗陷阱」描述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公眾都會給以負面的評價。
- 2 在既有研究中，狹義上的政治信任往往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為公民對特定政府機構(如政府)的制度性信任。本文界定的政府信任與狹義上的政治信任概念是可互換的。
- 3 根據Guo & Fraser (2015)，具體匹配的方法主要包括核匹配(kernel matching)、近鄰匹配(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馬氏距離匹配(Mahalanobis distance matching)等。本研究採用核匹配，匹配樣本通過了平衡性檢驗以及羅森鮑姆敏感性分析。同時，我們採用了1對4近鄰匹配、局部線性匹配、馬氏距離匹配進行穩健性分析，表明核匹配的匹配樣本是適用於後續分析的。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彙報具體的匹配過程。
- 4 根據陳雲松(2013)，個體對於電腦等ICT產品的個人偏好會成為一種穩定的個人特性，是決定人們ICT產品使用頻率和時間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選取的工具變量借鑒的是前人研究中的成功經驗。例如程中興和廖福崇(2017)使用「您用電腦嗎？是從來不用、偶爾用，還是經常用？」作為互聯網使用的工具變量，Tang et al. (2016)將「網絡接觸」(家庭是否接入互聯網的二分變量)作為工具變量，陳雲松(2013)採用「在2000年(含)之前是否擁有手機」作為互聯網使用的工具變量，探討其對非制度化政治參與行為的因果效應。我們選取問卷消費模塊「您家歷史上一共購買過多少台(電腦)？最近一次購買是什麼時間？」題項對工具變量進行操作化。
- 5 我們採用異方差穩健的Durbin-Wu-Hausman (DWH) 檢驗證實互聯網使用頻率是內生的( $p < .001$ )。採用第一階段Robust F統計量驗證弱工具變量問題，檢驗結果顯示該統計量為251.19，遠大於經驗值10，故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外生性檢驗首先進行2SLS迴歸，計算並獲取殘差，將殘差對其他外生性變量進行迴歸，獲得 $R^2$ ，構造檢驗統計量 $nR^2$ ( $n$ 為樣本量)，使用卡方分佈檢驗。模型7的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至少有一個工具變量不是外生的)。此外，我們還採用Sargan-Basman檢驗再次驗證變量的外生性，結果顯示Sargan-Basman統計量對應的 $p$ 值大於0.1，即接受了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假設(所有的工具變量都是外生的)，進一步證明本研究選取的工具變量與擾動項不相關，是外生的。此外，為了驗證IV模型的穩定性，我們還採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計法(LIML)和廣義矩估計(GMM)擬合模型，其結果與IV-2SLS結果幾乎一致。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呈現IV-LIML和IV-GMM模型結果。

- 6 模型7還控制了父親黨員身份和父親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目的在於控制潛在代際效應的影響。根據陳雲松(2013)，改革開放以後，相對富有的群體往往從體制中收益更大，對體制本身的依附性更緊，對體制的認同度更高；因此我們控制父親的黨員身份。此外，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與職業、教育程度、社會聲望顯著相關，既有研究顯示經濟條件和人力資本會通過代際轉移，因此我們通過控制父親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儘可能地消除家庭環境等代際因素/效應對個體政府信任的影響。我們還擬合了不控制代際效應的IV-2SLS模型，各解釋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大小和模式基本保持一致。
- 7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批評和建議。
- 8 馬太效應原指兩極分化的社會現象。在此處指的是具備較高與較低電腦使用偏好的兩個群體會在互聯網使用水平上出現差異甚至鴻溝，前者會出現互聯網使用上的「優勢」累積，而後者會更傾向於較少使用或基本不使用互聯網。
- 9 測量受訪者對網絡媒介依賴程度，詢問受訪者哪一種媒體是他們最主要的信息來源。若受訪者選擇互聯網為主要信息來源則編碼為1，其他(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則編碼為0。
- 10 本研究進一步檢驗了工具變量、網絡依賴、互聯網使用和政府信任各變量之間的關係。由於「電腦使用偏好」是潛變量，受到兩個工具變量的影響，因此我們採用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優度指標顯示整體結構模型良好( $\chi^2(3, N=8, 725) = 51.37$ ,  $RMSEA = .043$ ,  $GFI = .998$ ,  $NFI = .994$ )，檢驗結果為：「電腦使用偏好」對網絡依賴( $\beta = .49, p < .001$ )和互聯網使用( $\beta = .52, p < .001$ )均產生積極顯著的影響；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產生「解構」( $\beta = -.14, p < .001$ )效應；網絡依賴在直接「解構」政府信任( $\beta = -.03, p < .05$ )的同時，通過提升互聯網使用水平( $\beta = .42, p < .001$ )間接降低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 11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呈現中介和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王紹光 (2008)。〈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開放時代》，第2期，頁86–99。
- Wang Shaoguang (2008). Zhongguo gonggong zhengce yicheng shezhi de moshi. *Kaifang shidai*, 2, 86–99.
- 王磊 (2017)。〈在象徵與現實之間：經濟績效中的合法性邏輯〉。《政治學研究》，第2期，頁109–124。
- Wang Lei (2017). Zai xiangzheng yu xianshi zhijian: Jingji jixiao zhong de hefaxing luoji. *Zhengzhixue yanjiu*, 2, 109–124.
- 史安斌、楊雲康 (2017)。〈後真相時代政治傳播的理論重建和路徑重構〉。《國際新聞界》，第9期，頁54–70。
- Shi Anbin, Yang Yunkang (2017). Hou zhenxiang shidai zhengzhi chuanbo de lilun chongjian he lujing chonggou. *Guoji xinwenjie*, 9, 54–70.
- 弗蘭西斯·福山 (1998)。《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李婉容譯)。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原書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Fulanxisi Fushan (1998). *Xinren: Shehui daode yu fanrong de chuanguzao* (Li Wanrong, Trans.). Huhehaote: Yuanfang chunabshe. (Original book: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呂傑華 (2011)。〈新媒體使用者之競選政見認知、政治信任與政治參與之行動〉。《資訊社會研究》，第20期，頁1–38。
- Lü Jiehua (2011). Xinmeiti shiyongzhe zhi jingxuan zhengjian renzhi, zhengzhi xinren yu zhengzhi canyu zhi xingdong. *Zixun shehui yanjiu*, 20, 1–38.
- 李路路、鍾智鋒 (2015)。〈「分化的後權威主義」——轉型期中國社會的政治價值觀及其變遷分析〉。《開放時代》，第1期，頁172–191。
- Li Lulu, Zhong Zhifeng (2015). “Fenhua hou de quanwei zhuyi”—Zhuanxing qi zhongguo shehui de zhengzhi jiazhiguan jiqi bianqian fenxi. *Kaifang shidai*, 1, 172–191.
- 汪玉凱 (2015)。〈網絡社會中的公民參與〉。《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第4期，頁34–38。
- Wang Yukai (2015). Wangluo shehui zhong de gongmin canyu. *Zhonggong zhongyang dangxiao xuebao*, 4, 34–3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孟天廣、楊明(2012)。〈轉型期中國縣級政府的客觀治理績效與政治信任——從「經濟增長合法性」到「公共產品合法性」〉。《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4期，頁122-135。

Meng Tianguang, Yang Ming (2012). Zhuanxing qi zhongguo xianji zhengfu de keguan zhili jixiao yu zhengzhi xinren—Cong “jingji zengzhang hefa xing” dao “gonggong chanpin hefa xing.” *Jingji shehui tizhi bijiao*, 4, 122-135.

季程遠、王衡、顧昕(2016)。〈中國網民的政治價值觀與網絡抗爭行為的限度〉。《社會》，第5期，頁64-87。

Ji Chengyuan, Wang Heng, Gu Xin (2016). Zhongguo wangmin de zhengzhi jiazhi guan yu wangluo kangzheng xingwei de xiandu. *Shehui*, 5, 64-87.

林岡、顧佳雯(2016)。〈論政治信任及其影響因素〉。《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120-126。

Lin Wang, Gu Jiawen (2016). Lun zhengzhi xinren jiqi yingxiang yinsu. *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120-126.

林南(2005)。《社會資本：關於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Lin, N. [2002].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Nan (2005). *Shehui ziben: Guanyu shehui jiegou yu xingdong de lilun* (Zhang Lei,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Lin, N. [2002].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姚君喜(2014)。〈媒介使用、媒介依賴對信任評價的影響——基於不同媒介的比較研究〉。《當代傳播》，第2期，頁19-24。

Yao Junxi (2014). Meijie shiyong, meijie yilai dui xinren pingjia de yingxiang—Jiyu butong meijie de bijiao yanjiu. *Dangdai chuanbo*, 2, 19-24.

施從美、江亞洲(2017)。〈政治傳播中媒介使用對主流媒體公信力的影響——以政府信任為中介的研究〉。《江海學刊》，第5期，頁117-124。

Shi Congmei, Jiang Yazhou (2017). Zhengzhi chuanbo zhong meijie shiyong dui zhuliu meiti gongxinli de yingxiang—Yi zhengfu xinren wei zhongjie de yanjiu. *Jianghai xuekan*, 5, 117-124.

胡安寧(2015)。《社會科學因果推斷的理論基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Hu Anning (2015). *Shehui kexue yinguo tuiduan de lilun jichu*.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胡安寧(2019)。〈主觀變量解釋主觀變量：方法論辨析〉。《社會》，第3期，頁183-209。

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 Hu Anning (2019). Zhuguan bianliang jieshi zhuguan bianliang: Fangfalun bianxi. *Shehui*, 3, 183–209.
- 胡榮、莊思薇 (2017)。〈媒介使用對中國城鄉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東南學術》，第1期，頁94–111。
- Hu Rong, Zhuang Siwei (2017). Meijie shiyong dui zhongguo chengxiang jumin zhengfu xinren de yingxiang. *Dongnan xueshu*, 1, 94–111.
- 胡榮、胡康、溫瑩瑩 (2011)。〈社會資本、政府績效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社會學研究》，第1期，頁96–117。
- Hu Rong, Hu Kang, Wen Yingying (2011). Shehui ziben, zhengfu jixiao yu chengshi jumin dui zhengfu de xinren. *Shehuixue yanjiu*, 1, 96–117.
- 馬得勇 (2007)。〈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對亞洲8個國家和地區的比較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5期，頁79–86。
- Ma Deyong (2007). Zhengzhi xinren jiqi qi yuan—Dui yazhou 8 ge guojia he diqu de bijiao yanjiu. *Jingji shehui tizhi bijiao*, 5, 79–86.
- 馬得勇 (2016)。〈政治傳播中的框架效應——國外研究現狀及其對中國的啟示〉。《政治學研究》，第4期，頁58–70。
- Ma Deyong (2016). Zhengzhi chuanbo zhong de kuangjia xiaoying—Guowai yanjiu xianzhuang jiqi dui zhongguo de qishi. *Zhengzhixue yanjiu*, 4, 58–70.
- 馬得勇、王麗娜 (2015)。〈中國網民的意識形態立場及其形成：一個實證的分析〉。《社會》，第5期，頁142–167。
- Ma Deyong, Wang Lina (2015). Zhongguo wangmin de yishi xingtai lichang jiqi xingcheng: Yige shizheng de fenxi. *Shehui*, 5, 142–167.
- 馬得勇、王麗娜 (2016)。〈公共輿論傾向如何形成？——對網民政治支持的實證分析〉。《探索》，第6期，頁33–44。
- Ma Deyong, Wang Lina (2016). Gonggong yulun qingxiang ruhe xingcheng?—Dui wangmin zhengzhi zhichi de shizheng fenxi. *Tansuo*, 6, 33–44.
- 高學德、翟學偉 (2013)。〈政府信任的城鄉比較〉。《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1–27。
- Gao Xuede, Zhai Xuewei (2013). Zhengfu xinren de chengxiang bijiao. *Shehuixue yanjiu*, 2, 1–27.
- 張明新、劉偉 (2014)。〈互聯網的政治性使用與我國公眾的政治信任——一項經驗性研究〉。《公共管理學報》，第1期，頁90–103。
- Zhang Mingxin, Liu Wei (2014). Hulianwang de zhengzhixing shiyong yu woguo gongzhong de zhengzhi xinren—Yixiang jingyan xing yanjiu. *Gonggong guanli xuebao*, 1, 90–10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 盛智明(2013)。〈社會流動與政治信任——基於CGSS2006數據的實證研究〉。《社會》，第4期，頁35-59。
- Sheng Zhiming (2013). Shehui liudong yu zhengzhi xinren jiyu CGSS2006 shuju de shizheng yanjiu. *Shehui*, 4, 35-59.
- 章秀英、戴春林(2014)。〈網絡使用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及其路徑——基於9省18個縣(市)的問卷調查〉。《浙江社會科學》，第12期，頁94-100。
- Zhang Xiuying, Dai Chunlin (2014). Wangluo shiyong dui zhengzhi xinren de yingxiang jiqi lujing—Jiyu 9 sheng 18 ge xian(shi) de wenjuan diaocha. *Zhejiang shehui kexue*, 12, 94-100.
- 陳強(2014)。《高級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Chen Qiang (2014). *Gaoji jiliang jingjixue ji Stata yingyong*. Beiji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 陳雲松(2012)。〈邏輯、想像和詮釋：工具變量在社會科學因果推斷中的應用〉。《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192-216。
- Chen Yunsong (2012). Luoji, xiangxiang he quanshi: Gongju bianliang zai shehui kexue yingguo tuiduan zhong de yingyong. *Shehuixue yanjiu*, 6, 192-216.
- 陳雲松(2013)。〈互聯網使用是否擴大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基於CGSS2006的工具變量分析〉。《社會》，第5期，頁118-143。
- Chen Yunsong (2013). Hulianwang shiyong shifou kuoda fei zhidu hua zhengzhi canyu—jiyu CGSS2006 de gongju bianliang fenxi. *Shehui*, 5, 118-143.
- 陳雲松、吳曉剛(2012)。〈走向開源的社會學——定量分析中的複製性研究〉。《社會》，第3期，頁1-23。
- Chen Yunsong, Wu Xiaogang (2012). Zouxiang kaiyuan de shehuixue—Dingliang fenxi zhong de fuzhi xing yanjiu. *Shehui*, 3, 1-23.
- 陳雲松、范曉光(2010)。〈社會學定量分析中的內生性問題測估社會互動的因果效應研究綜述〉。《社會》，第4期，頁91-117。
- Chen Yunsong, Fan Xiaoguang (2010). Shehuixue dingliang fenxi zhong de neisheng xing wenti cegu shehui hudong de yingguo xiaoying yanjiu zongshu. *Shehui*, 4, 91-117.
- 陳雲松、賀光燁、吳賽爾(2017)。〈走出定量社會學雙重危機〉。《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第3期，頁15-27。
- Chen Yunsong, He Guanghua, Wu Saier (2017). Zouchu dingliang shehuixue shuangchong weiji. *Zhongguo shehui kexue pingjia*, 3, 15-27.
- 陳雲松、邊燕傑(2015)。〈飲食社交對政治信任的侵蝕及差異分析：關係資本的「副作用」〉。《社會》，第1期，頁92-120。

- Chen Yunsong, Bian Yanjie (2015). Yinshi shejiao dui zhengzhi xinren de qinshi ji chayi fenxi: Guanxi ziben de “fu zuoyong”. *Shehui*, 1, 92–120.
- 陳福平 (2012)。〈市場社會中社會參與的路徑問題：關係信任還是普遍信任？〉。《社會》，第2期，頁84–104。
- Chen Fuping (2012). Shichang shehui zhong shehui canyu de lujing wenti: Guanxi xinren haishi pubian xinren? *Shehui*, 2, 84–104.
- 彭芸 (2004)。〈我國大學生的媒介使用，社會資本與政治信任對象之關連性研究〉。《新聞學研究》，第79期，頁91–133。
- Peng Yun (2004). Woguo daxuesheng de meijie shiyong, shehui ziben yu zhengzhi xinren duixiang zhiguanlian xing yanjiu. *Xinwenxue yanjiu*, 79, 91–133.
- 彭蘭 (2012)。〈從「大眾門戶」到「個人門戶」——網絡傳播模式的關鍵變革〉。《國際新聞界》，第10期，頁6–14。
- Peng Lan (2012). Cong “dazhong menhu” dao “geren menhu”—Wangluo chuanbo moshi de guanjian biange. *Guoji xinwenjie*, 10, 6–14.
- 游宇、王正緒 (2014)。〈互動與修正的政治信任——關於當代中國政治信任來源的中觀理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2期，頁178–193。
- You Yu, Wang Zhengxu (2014). Hudong yu xiuzheng de zhengzhi xinren—Guanyu dangdai zhongguo zhengzhi xinren lai yuan de zhongguan lilun. *Jingji shehui tizhi bijiao*, 2, 178–193.
- 程中興、廖福崇 (2017)。〈「大交通」時代的媒介形態與政治信任：基於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統計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第6期，頁51–67。
- Cheng Zhongxing, Liao Fuchong (2017). “Da jiaotong” shidai de meijie xingtai yu zhengzhi xinren: Jiyu shijie jiazhi guan diaocha de tongji fenx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6, 51–67.
- 黃健、鄧燕華 (2012)。〈高等教育與社會信任：基於中英調查數據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第11期，頁98–111。
- Huang Jian, Deng Yanhua (2012). Gaodeng jiaoyu yu shehui xinren: Jiyu zhongying diaocha shuju de yanjiu. *Zhongguo shehui kexue*, 11, 98–111.
- 鄒宇春、敖丹、李建棟 (2012)。〈中國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會資本影響——以廣州為例〉。《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頁131–148。
- Zou Yuchun, Ao Dan, Li Jiandong (2012). Zhongguo chengshi jumin de xinren geju ji shehui ziben yingxiang—Yi Guangzhou weili. *Zhongguo shehui kexue*, 5, 131–148.
- 翟學偉 (2014)。〈信任的本質及其文化〉。《社會》，第1期，頁1–26。
- Zhai Xuewei (2014). Xinren de benzhi jiqi wenhua. *Shehui*, 1, 1–2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5期(2021)

- 趙曉航、李建新(2017)。〈當代青年的互聯網使用與社會信任——基於CGSS2013數據的實證研究〉。《青年研究》，第1期，頁19-27。
- Zhao Xiaohang, Li Jianxin (2017). Dangdai qingnian de hulianwang shiyong yu shehui xinren—Jiyu CGSS2013 shuju de shizheng yanjiu. *Qingnian yanjiu*, 1, 19-27.
- 劉嘉薇(2006)。〈大眾傳播媒介與大學生政治信任感關聯性之研究〉。《東亞研究》，第1期，頁161-196。
- Liu Jiawei (2006). Dazhong chuanbo meijie yu daxuesheng zhengzhi xinren gan guanlianxing zhi yanjiu. *Dongya yanjiu*, 1, 161-196.
- 劉嘉薇、黃紀(2010)。〈持續與變遷——政治資訊對大學生政治信任感影響之定群追蹤研究〉。《政治學報》，第50期，頁111-146。
- Liu Jiawei, Huang Ji (2010). Chixu yu bianqian—Zhengzhi zixun dui daxuesheng zhengzhi xinren gan yingxiang zhi dingqun zhuzhong yanjiu. *Zhengzhi xuebao*, 50, 111-146.
- 潘祥輝(2011)。〈去科層化：互聯網在中國政治傳播中的功能再考察〉。《浙江社會科學》，第1期，頁36-43。
- Pan Xianghui (2011). Qu keceng hua: Hulianwang zai zhongguo zhengzhi chuanbo zhong de gongneng zai kaocha. *Zhejiang shehui kexue*, 1, 36-43.
- 盧春天、權小娟(2015)。〈媒介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基於CGSS2010數據的實證研究〉。《國際新聞界》，第5期，頁66-80。
- Lu Chuntian, Quan Xiaojuan (2015). Meijie shiyong dui zhengfu xinren de yingxiang—Jiyu CGSS2010 shuju de shizheng yanjiu. *Guoji xinwenjie*, 5, 66-80.
- 盧春龍、嚴挺(2015)。〈政治傳播與政治信任的關係——以中國農民的政治信任為考察對象〉。《學習與探索》，第12期，頁48-56。
- Lu Chunlong, Yanting (2015). Zhengzhi chuanbo yu zhengzhi xinren de guanxi—yi zhongguo nongmin de zhengzhi xinren wei kaocha duixiang. *Xuexi yu tansuo*, 12, 48-56.
- 薛可、余來輝、餘明陽(2017)。〈媒介接觸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基於中國網民群體的檢驗〉。《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4期，頁131-136。
- Xue Ke, Yu Laihui, Yu Mingyang (2017). Meijie jiechu dui zhengfu xinren de yingxiang: Jiyu zhongguo wangmin qunti de jianyan. *Xiandai chuanbo—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4, 131-136.
- 韓娜(2015)。〈社交媒體對政治傳播影響的研究——基於批判的視角〉。《新聞記者》，第8期，頁81-86。

- Han Na (2015). Shejiao meiti dui zhengzhi chuanbo yingxiang de yanjiu—Jiyu pipan de shijiao. *Xinwen jizhe*, 8, 81–86.
- 羅家德、帥滿、楊鯤昊 (2017)。〈「央強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社會學分析——基於汶川震後三期追蹤數據〉。《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頁84–101。
- Luo Jiade, Shuai Man, Yang Kunhao (2017). “Yang qiang di ruo” zhengfu xinren geju de shehuixue fenxi—Jiyu wenchuan zhenhou sanqi zhuzhong shuju. *Zhongguo shehui kexue*, 2, 84–101.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lmond, G. A., &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ilard, C. S. (2012). Testing the internet's effect on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A multi-methodological, cross-na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9(2), 185–204.
- Becker, L. B., & Whitney, D. C. (1980). Effects of media dependencies: Audience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1), 95–120.
- Cameron, A. C., & Trivedi, P. K. (2005). *Micro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ffee, S. H., Ward, L. S., & Tipton, L. P. (1970).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47(4), 647–666.
- Chanley, V. A., Rudolph, T. J., & Rahn, W. M. (2000).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 time series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3), 239–256.
- DiMaggio, P., & Bonikowski, B. (2008). Make money surfing the web?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earnings of US work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2), 227–250.
- DiMaggio, P., & Hargittai, E. (2001). *From the “digital divide” to “digital inequality”: Studying internet use as penetration increases*. Princeton, NJ: Centre for Arts and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 Guo, S., & Fraser, M. W. (2015).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age.
- Hetherington, M.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791–808.
- Im, T., Cho, W., Porumbescu, G., & Park, J. (2014). Internet,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citizen compli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24(3), 741–763.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55 期 (2021)

- Inglehart, R., & Welzel, C.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tschelt, H. (1992). The formation of party system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olitics & Society*, 20(1), 7–50.
- Lei, Y. W. (201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netize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8(3), 291–322.
- Lichter, S. R., Lichter, L. S., & Amundson, D. (1999). *Images of government in TV entertainmen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
- Lu, J. (2013). Acquir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Various media channel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rrel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3), 828–849.
- McLeod, J. M. (2000). Media and civic socialization of you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7(2), 45–51.
- Miller, J. M., & Krosnick, J. A. (2000). News media impact on the ingredients of presidential evaluations: Politically knowledgeable citizens are guided by a trusted sour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2), 301–315.
- Mishler, W., & Rose, R. (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1), 30–62.
- Moy, P., & Pfau, M. (2000). *With malice toward all? The media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stport, CT: Praeger.
- Newton, K. (2001). 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2), 201–214.
- Norris, P. (1999).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 In P.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pp. 1–3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2000).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lasser, F., & Ulram, P. A. (1996). Measuring political culture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olitical trust and system support. In F. Plasser & A. Pribershy (Eds.), *Political culture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p. 3–33). Aldershot, Hants: Avebury.
- Robinson, M. J. (1976).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2), 409–432.
- Rosenbaum, P. R., & Rubin, D. B. (1983).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 70(1), 41–55.
- Shi, T.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4), 401–419.

- Stock, J., & Yogo, M. (2005). Asymptotic distribution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statistics with many instruments. In D. W. Andrews & J. H. Stock (Eds.),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for econometric models* (pp. 109–120).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ckmann, D., & Gallagher, M. E. (2011). Remote control: How the media sustain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4(4), 436–467.
- Tang, W., Zhang, Y., & Martin, S. (2016). Revolution postponed—The limit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promoting democracy in China. In W. Shan & L. Yang (Eds.), *Chang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1–34).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Press.
- Thurlow, C., Lengel, L. & Tomic, A. (2004).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Sage.
- Tong, Y. (2011). Morality, benevolence, and responsibility: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from past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2), 141–159.
- Wang, Z. (2005).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 155–171.
- Wei, L., & Hindman, D.B. (2011). Does the digital divide matter more?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use on the education-based knowledge gap.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4(2), 216–235.
- Willis, S., & Tranter, B. (2006). Beyond the “digital divide” Internet diffusion and inequality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Sociology*, 42(1), 43–59.
- Xie, Y. (2007). Otis Dudley Duncan’s legacy: The demographic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reasoning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5 (2), 141–156.
- Zhang, P.H. (2013). *Digital divides an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 longitudinal quantitative study of internet users in US from 2000 to 2010*.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pella University, Minneapolis, Minnesota.
- Zhu, J., Lu, J., & Shi, T. (2013). When grapevine news meets mass media: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opular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8), 920–946.

## 本文引用格式

程蕭瀟、金兼斌(2021)。<〈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基於CGSS2010數據的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5期，頁57–91。